

抗日战争 与 中国社会变迁

韩文琦 程卫华◎著

国防大学出版社



抗日战争与中国社会变迁

韩文琦 程卫华 著

国防大学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抗日战争与中国社会变迁/韩文琦著. —北京:
国防大学出版社, 2015. 7

ISBN 978 - 7 - 5626 - 2324 - 3

I. ①抗… II. ①韩… III. ①抗日战争—影响—社会变迁
—研究—中国 IV. ①K265. 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49123 号

抗日战争与中国社会变迁

KANG RI ZHAN ZHENG YU ZHONG GUO SHE HUI BIAN QIAN

韩文琦 程卫华 著

出版发行: 国防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红山口甲 3 号

邮 编: 100091

电 话: 010 - 66772856

责任编辑: 王文晓

责任校对: 刘淑宏

装帧设计: 王联众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天宇万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 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6.75

字 数: 247 千字

印 数: 1 - 2000 册

版 次: 2015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6.00 元

序 言

忆往昔，看今朝。五千年岁月弹指一挥间。当历史的车轮，驶入了朝气蓬勃的2015年，我们满怀希望奋斗在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征程中，昂首阔步、斗志昂扬。201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一个伟大的历史事件，总会给人以深邃的思考……

70年前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正义战争，是在中国共产党主张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全国各族人民包括港澳台同胞、海外侨胞共同进行的民族解放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中华民族自鸦片战争以来第一次彻底打败外来侵略者，取得国家和民族独立的伟大战争。在这场大战中，中日两国倾尽国力，战火波及中国东部、中部的绝大部分地域，日本帝国主义的肆意践踏与中国人民的奋起抗争，法西斯主义挑起世界大战与全世界人民对法西斯的顽强抵抗，说到底，那是一场文明与野蛮的大搏斗。

毫无疑问，70年前那场席卷中华大地的历史灾难，对中国社会造成了空前破坏，打断了业已蹒跚起步的中国近代化进程。但是，战争也以特殊的形式促使中国社会形态发生了巨大改变，全面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发展进步，成为中华民族走向新生的圣洁洗礼。正因此，希望《抗日战争与中国社会变迁》这本小书，如同一个窗口，让人们看到当年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暴行，看到中华儿女的英勇抗争，看到共产党人的精神风骨，看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巨大威力，看到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人们的正义之声，更

看到一个民族涅槃重生的希望！正如习近平同志深刻指出：“近代以来，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进行的一系列抗争，就是中华民族觉醒的历史进程，就是中华民族精神升华的历史进程。这种民族觉醒和民族精神升华，在抗日战争时期达到了全新的高度……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决定因素。”

第一章 中国多元政治格局的形成	(1)
一、国共两党社会政治力量此消彼长	(1)
(一) 北伐时期及抗日战争爆发前夕的国共实力对比	(2)
(二) 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实力的变化	(4)
(三) 抗日战争期间共产党实力的不断壮大	(6)
(四) 抗战后期国共两党实力的对比反转	(9)
二、中间势力形成与政治格局“均衡”	(12)
(一) 抗战前夕各中间势力的初步形成	(13)
(二) 中间势力的抗日意愿	(14)
(三) 抗日战争期间各中间势力的救亡行动	(19)
(四) 中间势力的巩固与均衡政治格局的形成	(22)
三、各阶层、阶级重新分化、组合	(23)
(一) 军人群体的迅速扩张壮大	(24)
(二) 知识分子阶层的分化重组	(26)
(三) 工人阶级和妇女群体政治觉悟不断提升	(30)
第二章 中国经济夹缝中发展实态	(33)
一、侵略者残暴摧残的中国工业	(33)
(一) 主要行业 and 部门损失情况	(34)
(二) 日本“以战养战”策略的实施	(36)
(三) 劫运回日本的工矿类物资	(40)
(四) 日本对关内沦陷区的经济掠夺	(41)

(五) 对物资和贸易的统制	(44)
二、东部经济由发达到残破不堪	(47)
(一) 战前东部经济发展状况	(47)
(二) “华北产业开发指导纲领”	(48)
(三) 日本侵略者破坏经济的手段	(53)
(四) 东部经济遭受到重大损失	(56)
三、西部经济开始艰难启动	(60)
(一) 抗战前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极为低下	(60)
(二) 东部沿海工厂内迁	(62)
(三) 国民政府发展西部经济的举措	(65)
(四) 艰难起步的西部经济	(69)
四、东北地区殖民经济畸形膨胀	(73)
(一) 《满洲产业开发五年计划》的制定和实施	(74)
(二) 工矿业的比重增加, 农业生产停滞	(77)
(三) 重工业、军事工业比重加大	(80)
(四) 经济统制政策	(82)
(五) 对日本经济依附性进一步加强	(85)
第三章 中国西南地区文化与教育的发展	(88)
一、高校西迁与抗战教育基地形成	(88)
(一) 大批高校内迁西南	(88)
(二) 抗战教育基地形成	(97)
二、西南地区教育及文化事业发展	(99)
(一) 开启了西南地区教育的近代化	(99)
(二) 促进了西南地区科技的大发展	(106)
(三) 带动了西南地区文化的大繁荣	(112)
三、东西部社会经济差距大大缩小	(123)
(一) 国民政府开发西南的酝酿	(123)
(二) 内迁高校与西南经济开发	(125)
(三) 东西部社会经济差距缩小	(127)

四、社会整体性在融合交流中不断整合	(129)
(一) 社会风俗在交流中融合	(129)
(二) 民主与科学精神深入人心	(130)
(三) 近代女性观念意识大为增强	(131)
第四章 中国国防现代化在战争中推进	(133)
一、加速中国军队武器装备更新	(133)
(一) 大量引进德造装备	(134)
(二) 艰难的外国援助	(136)
(三) 谋求兵器自给的努力	(138)
二、加快中国军队兵种体制发展	(141)
(一) 组建装甲兵部队	(141)
(二) 组建整训炮兵部队	(142)
(三) 扩建空军	(143)
(四) 加强海军	(143)
(五) 优化陆军体制编制	(146)
三、锻造了一大批优秀军事人才	(147)
(一) 抗日战争吸引了中国无数的优秀人才加入 军事抗战行列	(147)
(二) 战时院校教育夯实了抗战人才的理论基础	(149)
(三) 抗日战场实践锤炼了中国军事精英的实际才干	(153)
四、丰富发展了中国的军事理论	(154)
(一) 持久战理论应时而生	(154)
(二) 游击战理论得以突出发展	(155)
(三) 人民战争理论在实践中趋于完善	(156)
(四) 国民政府海军作战理论得以创新	(157)
第五章 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角色转变	(159)
一、抗战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159)
(一) 中国抗日战争代表了世界历史的前进方向	(159)

(二) 中国抗日战场开辟带来了巨大国际影响	(161)
二、中国军民以巨大民族牺牲打乱了日军部署	(165)
(一) 对日本“北进战略”的牵制	(165)
(二) 对日本“南进战略”的牵制	(166)
(三) 导致日本“西进战略”的夭折	(169)
(四) 对日本外交战略的牵制	(171)
三、世界开始意识到中国所蕴藏的巨大潜力	(181)
(一) 英、美重新审视援华案	(182)
(二) 推动美、英战略向制约日本方向发展	(185)
(三) 坚决抵制对日谈判妥协	(188)
四、抗日战争成为中国开始独立、平等外交里程碑	(191)
(一) 初次吸引世界目光	(191)
(二) 渐渐有了话语权	(194)
(三) 获得了英、美国家的平等相待	(195)
第六章 中华民族国家观念的空前觉醒	(197)
一、多难兴邦在全民族抗战事业中的应验	(197)
(一) 战争磨难与“东方睡狮”的觉醒	(198)
(二)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中华民族的惊天怒吼	(201)
(三) 民族英雄辈出，经历着血与火的残酷考验	(204)
二、国耻国难是民族凝聚力的催化剂	(211)
(一) 外敌入侵，懵懂的决策	(212)
(二) 奋起抵抗，民心的凝聚	(213)
(三) 负重弥坚，喷薄的红日	(214)
三、抗战孕育推进着现代国家观念	(218)
(一) 不能忘却的欺辱	(219)
(二) 救亡图存的不屈抗争	(221)
(三) 百年涅槃的辉煌	(223)
四、中华民族国家意识从近代向现代和当代转型	(225)
(一) 在家族观念中挣扎	(226)

(二) 在历史动荡中唤醒	(228)
(三) 在革命浪潮中转型	(230)
第七章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起步	(233)
一、中国的国际地位得以重塑和提高	(233)
(一) 从被轻视到受重视	(233)
(二) 从沦为附庸到成为盟友	(235)
(三) 从遭受掠夺到获得援助	(236)
(四) 从蒙受侵权到赢得平等	(237)
(五) 从无足轻重到举足轻重	(238)
二、中国现代民族意识得以激发和觉醒	(240)
(一) 在政治上, 从专制独裁的黑暗政治走上了一定 程度的以民主自由为核心的现代政党政治	(240)
(二) 在军事上, 从每战必败的屈辱历史走上了勇于 抗击外强的新历史	(243)
(三) 在外交上, 从崇洋媚外的“洋奴外交”走上了初步的 以维护国家民族利益为核心的现代外交	(244)
(四) 在民族关系上, 从“四夷宾服”的民族关系转变为 “四海之内是一家”的新民族关系	(244)
(五) 在社会心理上, 从盲目排外的“仇洋”心态和 “百事不如人”的“媚洋”心态转变为成熟 自信的现代民族心态	(245)
三、中国共产党民主政治思想得以形成与发展	(246)
(一)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民主政治思想的形成	(246)
(二)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民主政治思想的实践	(249)
四、中华民族走向振兴的伟业得以开启并运行	(251)
(一) 洗雪百年耻辱	(252)
(二) 收回祖国宝岛台湾	(253)
(三) 发展壮大人民革命力量	(254)
后 记	(256)

第一章 中国多元政治格局的形成

尽管对日本的狼子野心，中国各界早已有认识，但当日本真正对中国展开军事进攻时，仍给原本纷争不断的中国社会带来了巨大的震荡和动乱。各种政治势力都不得不面对一个残酷的现实：倭人来犯，中国将亡。大浪淘沙，始见真金，不同的政治势力，在这场事关国家兴替、民族兴亡的关键之战中，不断地联合、斗争、分化、融合，也由此逐渐形成了一个全新的政治格局……

一、国共两党社会政治力量此消彼长

正如《剑桥中国史》在讲到国民革命时所言：“20 世纪 20 年代的国民党的革命，是中国现代史中最使人感兴趣的一个事件，它的成功是因为它为爱国和革命的目标出色地动员了人力和物质资源。”^①毫无疑问，20 世纪 20 年代的中国政坛，国民党是当之无愧的主角。在孙中山地不懈努力和苦苦探索中，国民党找到了一条帮助中国建立统一国家、摆脱西方列强控制的真正的革命道路，并得到了实实在在的支援：在苏联的扶持下，孙中山在广东广州黄埔区的长洲岛建立了一所近代中国史上影响力巨大的军事学校——黄埔军校。当时作为共产国际一个支部的中国共产党，则将主要精力用于帮助国民党建立有效的军队政治组织、发动底层群众、宣传革命思想，两党无论在军事实力还是人员数量、社会影响等各方面，实力都

^① 费正清、杨品泉等：《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1949 年）》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519 页。

非常悬殊。然而，经过抗日战争的洗礼之后，双方的力量对比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一）北伐时期及抗日战争爆发前夕的国共实力对比

20 世纪 20 年代初期，国民党只在上海设立有中央党部，除了广州市之外，在其他城市连一个像样的支部都不曾建立。但当 20 年代结束时，通过北伐战争的快速扩张，在国民党的旗帜下已经聚集了大批来自不同层次的革命精英，他们有的在晚清政府中担任过官员，有的在欧美大学取得了学位，有的在日本、德国的军事院校受过良好的训练。更重要的是，由苏联人资助建立的黄埔军校，为国民党以及整个中国近代革命培养了大批卓越的军事人才。依靠黄埔学生组织的国民党中央军，在同广东的陈炯明、两湖的吴佩孚、江浙的孙传芳较量的过程中，实力和影响力不断壮大。国民政府的统治区域也由珠江流域逐步扩展到长江流域，并最终剑指北京，迫使张作霖撤回关外。到 1928 年张学良在东北宣布易帜时，国民党最终完成了在形式上对全国的统一。

大革命初期，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的要求下，积极配合国民党进行北伐，并在北伐过程中取得了一定的影响力，但在北伐胜利在望之际，国民党当局却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上海的工人纠察队被解除武装，大批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杀害，整个中共党组织的实力被严重削弱。共产党在武汉、广州的党组织被清洗，上海的中共中央党部被迫转入地下活动，全国各地的共产党员不得不躲到深山密林以及远离城市的乡村之中以保存革命的火种。

伴随共产党的“被清洗”，国民党内左、右两派也进行了激烈的斗争，最终，蒋介石作为北伐军的总指挥，以强有力的军事行动和精明的政治手段取得了这一斗争的胜利：“宁汉合流”，代表国民党左派的武汉国民政府最终迁至南京，加入了南京国民政府。

这便是 20 世纪 20 年代末、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前的国共两党现状：国民党作为当时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尽管在形式上取得了国家的统一，但却面对着党内派系林立、国内军阀混战、国外列强磨刀霍霍的复杂局面；而这一时期的共产党，在遭遇了国民党的残酷清洗后，党员人数大减，组

织机构破坏殆尽，党员人数仅剩万余人，革命力量所剩无几，不得不转移至远离城市的农村和山区开展游击战和建设农村根据地。

1931年，农历辛未年（羊年），民国二十年，日本昭和六年。这一年，因为“九一八”事变而为国人所铭记：1931年9月18日夜，在日本关东军秘密策划下，驻南满铁路的日本铁道“守备队”，炸毁沈阳柳条湖附近日本修筑的南满铁路路轨，却栽赃嫁祸于当地中国驻军，并以此为借口，炮轰东北军沈阳驻军所在地北大营。此后在短短不到半年时间里，整个东北三省全部沦陷，东北人民从此开始了长达14年的抗日斗争。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开始，也由此揭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东方战场的序幕。

而在“九一八”事变发生之前，1930年底到1931年9月，蒋介石先后组织兵力，对共产党所统治的苏区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围剿”，结果均以失败告终。

与此同时，驻扎深山和农村的中国共产党通过打土豪分田地发动农民加强苏区建设，到1931年11月，已将赣南、闽西两块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了以瑞金为中心的拥有21座县城、5万平方千米、250万人口的全国最大的根据地——中央根据地。在此基础上，共产党成立了第一个全国性的中央政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正式与国民党南京政府分庭抗礼。

当抗日的战火在东北燃起，国民党已经在形式上取得了全国的执政地位，与此同时共产党仍在为自身存在的合法性努力奋斗。但纵观整个抗日战争全过程，国民党并没有利用好其所拥有的巨大的优势，相反，却因为错误的战略、消极的抵抗，加上官员和军队的贪腐，使得在这场与外族的对抗中，一步步失去了民心。

1936年，当中日之间已在华北剑拔弩张之时，蒋介石依然在忙着剿灭刚在陕北落脚的红军，而他所派来剿灭红军的十七路军和东北军，都是地方军阀。这是一个渔翁之举：如若成功，消灭掉的就不仅是共产党，而且还有两大地方实力派，从而国民党政府的统治将更加稳固。为此，南京国民政府制定了饱受争议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基本国策。客观来讲，一个国家要对抗外敌，内部的团结一致的确是一个必要条件，但显然，蒋介石

选错了时机。1936年的中国，日本已经统治东北五年之久，而在华北，日本华北驻屯军在这一年中先后制造两起“丰台事变”，将北平团团包围，蚕食华北之心昭然若揭。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在这样的情势下，民族矛盾已经上升为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团结一致抵抗外侮才是真正凝聚民心、维持政权的正确选择，但蒋介石却背道而驰，执意先“安内”再“攘外”，迟迟不肯正面抗日。

于是，在这一年的年底，当蒋介石亲赴西安督促张学良、杨虎城剿共时，震动全国的“西安事变”发生了。张、杨扣押蒋介石，主要是为了迫使南京国民政府放弃既定国策，“停止剿共，一致对外”，这正是共产党从“九一八”事变日本入侵东北以来一直呼吁的。在武力的胁迫和多方斡旋下，中华民族抗日统一战线最终形成，国民党与共产党在北伐之后再度合作，开始了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艰苦、最持久的一场防御战争。但从一开始的抗战，便受人“胁迫”，这使蒋介石颜面尽失，也使南京国民政府脸上无光，而被动应敌的开局在很大程度上也影响了日后国民党正面战场的抗战效果。

（二）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实力的变化

1937年8月，“国防最高会议参议会成立，由国防最高会议主席蒋介石聘请共产党、青年党、救国会和各界人士为参政员，作为国防最高会议的咨询机关。这成为国民参政会成立的基础”^①。但随着战事的发展，共产党实力的壮大和英、美等西方国家的介入，国民党再次回到了积极反共、消极抗日的道路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难以为继，第二次国共合作再次到了破裂的边缘。为此，原来参加参政会的农工民主党、青年党、救国会等党派于1941年3月组织了民主政团同盟，这一同盟一方面继续进行抗日活动；另一方面则强烈抵制国民党的一党独裁。为应对这样的局面，国民政府当局派出特务对同盟的成员进行监视，并查禁同盟的出版物。不仅如此，1942年，国民政府还对国民参政会进行了改组，通过“选举”使国

^① 刘小宁：《国民参政会——国共合作的产物》，《档案与建设》2008年第4期，第36页。

民党成员在整个参政会中占据压倒性的多数，最终使这个曾经的民主政治的象征，彻底丧失了民主性和独立性，沦为国民党独裁统治的工具。

国民党通过中统和军统加强对社会各阶层的政治控制，通过恐吓、酷刑、暗杀等各种残忍手段，对当时的民主人士和进步阶层进行严厉的政治压迫。这种类似明代东厂的特务组织，深入到社会的各个角落，搜查一切对政府不满者，并将他们秘密逮捕投入监狱。在中统和军统的黑暗统治下，普通民众不仅对国民政府的统治充满了恐惧，同时也增加了民众对国民党的憎恨，整个中国社会的人心所向开始发生改变，人们一方面渴望国民政府加紧抗日，抵御外侮；另一方面却又对国民党残暴的独裁统治心生忌惮，迫切渴望在战后建立一个真正的民主政权。

当时社会上的普遍心态可以通过一部名为《1942》的电影略知一二，该片讲述的是在抗战最激烈的1942年发生在中原大地上的大饥荒。因为连续几年的旱灾，导致土地歉收，而国民政府的官员依然强行征税，不顾民众死活，这种倒行逆施的行径，激起了巨大的民愤。“乡民偷偷地穿越战线，把猪、牛肉、大米和酒送给敌人。乡民情愿让敌人统治，却不想在自己政府下当自由民。”^① 驻守河南的国民党军汤恩伯因军纪混乱，被老百姓列为“四害”（水、旱、蝗、“汤”）之一。当日军向其进攻时，老百姓竟趁机缴了5万国军的枪械。恨国民党犹胜恨日本人，足见国民党民心尽失。

到1945年抗战结束时，胜利的喜悦还没来得及广泛传递，国民政府的各级接收大员便迫不及待地将在日伪留下的财产收归己有，暴露出“与民争利”的本性。“政府官员腐败，法律任其滥用，人民生活日益悲惨绝望。尽管国困民贫，一小撮贪污腐化分子却愈益富有，生活愈益奢华。这种腐败现象，加上其他许多反动的政治因素，已使民气士气低落，几至于殆尽。”^② 这便是国民党在经历抗战之后得到的评价。国民党从一开始的进步革命政党，经过革命的洗礼和不断的建设，一步步取得执政地位，却在饱

^① 费正清、杨品泉等：《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1949年）》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601页。

^② 费正清、费维恺：《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1949年）》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687页。

尝权力的滋味后逐渐退化为一个纯粹的官僚阶级，与普通民众离心离德，最终彻底丧失了自身的统治基础，站在了人民的对立面，这也是为什么在抗战胜利之后，拥有强大军事实力和先进武器装备的国民政府，却在短短的3年时间里迅速垮台的主要原因：“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历史的覆辙在国民党的统治历程中，再次被重蹈。

（三）抗日战争期间共产党实力的不断壮大

反观同一时期的共产党，却是另一番景象。

长期以来，共产党始终警惕着日本对中国的狼子野心，1935年，当红军还在长征途中时，“根据共产国际‘七大’的精神，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共中央委员会、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名义，于8月1日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著名的《八一宣言》”^①。提出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号召全体同胞团结起来，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这一宣言迅速赢得了全国各个阶层的支持和拥护。

在“西安事变”中，共产党积极与事变发起者张学良、杨虎城联系，经过多方权衡考量，做出重大让步，选择了最有利于国家民族发展的道路，共同逼迫蒋介石放弃剿共，一致抗日，为保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共产党与国民党协商，同意：（1）为实现三民主义而奋斗；（2）停止武装暴动、苏维埃运动与强制没收地主土地三项政策；（3）取消现存的苏维埃政府，改为国民政府边区政府；（4）取消红军番号。与此同时，国民党同意共产党在西安、武汉、重庆等主要城市设立联络处，并允许出版发行《新华日报》。

共产党在抗日问题上的鲜明立场和强有力的实际行动，为共产党赢得了广大民心。“到延安去！”成为抗战时期广大高校学生和有志青年的共同心声。

1939年，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指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是中国革命的三个基本问题。毛泽东还指出，“我们一定不

^① 《党史天地》编辑部：《共产国际代表林育英回国》，《党史天地》2007年第8期，第80页。

要分裂统一战线，但又决不可自己束缚自己的手脚”。在今天看来，这一认识是十分全面和科学的，并且在当时为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保持自身的独立性提供了指导思想，使共产党在第二次国共合作中避免了被国民党再次清洗和镇压。

依靠强有力的领导和在抗日战争问题上所赢得的巨大声望，共产党迅速地发展起了一支完全属于自己的抗日力量。当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时，共产党还只有4万余党员，这还不及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共产党员人数。但到1940年，这一人数达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80万，在日本人占据的大片中国土地上，共产党见缝插针地建立起了诸多依托农村的革命根据地，在这些抗日根据地中，共产党人扮演着团结人民群众一致抵抗日本侵略者的领导者的角色。让这么庞大数量的党员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难题。为抗战和争取民众的需要，共产党在中央成立了群众运动委员会、职工运动委员会、青年运动委员会、妇女运动委员会等组织，通过强有力的组织动员和思想宣传，使广大人民群众不分年龄、不分性别，牢牢地团结在党组织周围，凝聚成了巨大的人民抗战力量，使抗日战争真正变成了一场人民战争，也使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力得到了进一步扩大。

为保证党中央制定政策的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还在全国各主要地区成立了地方局，主要有：华北局、西北局、长江局、南方局，中原局、东南局（1941后与中原局合并为华中局）。在各抗日根据地还成立各分局：晋察冀分局、山东分局、晋绥分局、晋东南分局（晋冀鲁豫中央局的一部分）、华南分局。通过设立地方局，一方面保证了党中央政策在各控制区和领域的正确执行，同时又能确保各地革命工作的相对独立性和完整性，并保障某一个地区遭到敌人破坏后，其他各局仍能继续开展革命工作而不致陷入瘫痪。

除了依靠数量不多的两支正规军——八路军和新四军，共产党在进行抗战时，更多的是依靠各地的地方武装力量和民兵。他们本身就是当地的普通民众，对当地的风土人情、地形地貌足够了解，因而可以充分利用各种条件，抵抗外敌入侵，提高战斗的胜利率。在华北平原上，当地的游击